

新 知 文 库

卢梭·康德·歌德

卡西尔著 刘 东译



卢梭·康德·歌德

新 知 文 库 77

卡西尔著

刘 东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京)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袁 春

封面设计：海 洋

Ernst Cassirer

ROUSSEAU KANT GOETHE

新 知 文 库

卢梭·康德·歌德

LUSUO KANGDE GEDE

〔德国〕 恩斯特·卡西尔著

刘 东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4印张 67,000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定价3.00元

ISBN 7-108-00277-9/K·34

序 言

这本小书收入的两篇论文，虽说论题不一样，却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它们都力求从不同的角度去阐述十八世纪的文化，并且说明产生该文化的“思想气候”（我这是借用了怀特海的术语）。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启蒙运动的哲学》一书中更为详尽地讨论过。眼下，我正着手准备即将问世的该书英文修订本。而与此同时，我希望这些论文能被当作那本大部头著作的导言来读。

借此机会，我谨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和理事们致谢：在当前的困难处境中，他们仍然决定出版本书的英译本。同时，我由衷地感谢小约翰·H·兰德尔教授，是他建议我在由《思想史杂志》所编辑的系列专著中发表这两篇论文。最后，对于詹姆斯·古特曼、保罗·奥·克利斯特勒和小约翰·H·兰德尔的出色翻译，我更要特别道谢。

恩斯特·卡西尔

一九四四年十月于哥伦比亚大学

目 录

康德与卢梭	1
1. 个人的影响	1
2. 卢梭与人性学说	21
3. 法律与国家	31
4. 乐观主义问题	43
5. “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	52
6. 结论	66
资料与文献	71
歌德与康德哲学	73
资料与文献	120
译后记	121

康德与卢梭

1. 个人的影响

康德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他那间大有斯巴达之风的书房，简朴无华，只有唯一的一件装饰品——墙上的让·雅克·卢梭肖像。有关康德生平的最早描述还从其他方面提供了种种证据，说明康德对卢梭之其人其书是怎样的五体投地。最为人稔知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严守时刻表，并且惯于按钟点支配自己日常工作的康德，只有一次打破了常规——当卢梭的《爱弥儿》问世以后，由于康德醉心于研读这本使他手不忍释的书，竟然放弃了每天例行的散步。

不过，我们并不需要以这类故事来证明卢梭对康德的影响之深。康德本人的可靠陈述更加历历可见，给人的印象也更深刻。不待言，康德并不认为他从卢梭那里继承了任何特定的教条。我们毋宁说，在他思想发展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上，是卢梭为他展示了那个终生不渝的方向。康德不是把卢梭看成一种新“体系”的创建者，而是把他看成一位思想者，这位思想

者拥有对哲学之本性与功能的崭新见解，拥有对哲学之使命与尊严的崭新观念。年届四旬的 康德 写道：

“我自以为爱好探求真理，我感到一种对知识的贪婪渴求，一种对推动知识进展的不倦热情，以及对每个进步的心满意足。我一度认为，这一切足以给人类带来荣光，由此我鄙夷那班一无所知的芸芸众生。是卢梭纠正了我。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性，而且假如我不是相信这种见解能够有助于所有其他人去确立人权的话，我便应把自己看得比普通劳工还不如。”^①

乍看上去，卢梭竟能在康德心中造成如此的转变，简直是难以思议的。是什么东西使两种个性之间的鸿沟得以弥合呢？他们之间到底是存在某种直接的沟通呢，还是相反在特点和气质、生活遭遇和生活方式上恰成鲜明的对照？如果我们审慎地考察康德和卢梭在人格上和哲学上的发展，就会发现这两个人是毫不相干的。他们分属于天悬地隔的两个世界。费希特有句名言：“一个人之所以选择某种哲学，正因为他是这种人，因为一种哲学体系决非人们可以恣意取舍的无生命的家什，它因掌握它的人的精神而充满灵性。”^② 如果这句格言被严格推广运用，便不大可能

① 《片断》，哈登斯坦编辑，第八卷，第624页。

② 费希特：《知识学引论第一篇》，全集第一卷，第434页。

在卢梭和康德之间找到任何联系。因为在哲学史的全部范围之内，我们几乎找不到比这更不合拍的两种精神了。

稍稍回顾一下他们生活的外部进程，将大大有助于我们清澈见底地看到两人天性之间的对比。在康德那里，规范与方法构成了生机盎然和鼓舞人心的原则，它们越来越有力量，不仅统摄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及其变化，而且仿佛湮没了它的具体内容。卢梭也曾徒然地以某种规范来支配自己的生活，或者以某种计划去梳理它。他每每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而到头来，生活也以对立的冲动使他困惑迷蒙。对于任何职业，对于任何科学、学说和宗教，他总是感到有点儿碍手碍脚。他先后当过 镂刻匠、家仆、收税人、官吏、家庭教师、乐谱缮写人、外交秘书、乐师和作曲家，直到最后才找到了他真正的天职：思想家和作家。尽管他受过加尔文教严格教规的熏陶，但一有机会，他就改信了天主教；而当他于一七五四年返回家乡日内瓦时，他又照样放弃了后者。他一生东游西荡，行色匆匆，只有年轻时在沙尔美特度过的那段安详恬静的岁月堪称例外。

卢梭将此看作自己的宿命；这种宿命不仅从外部强制着他，如他晚年被从一地驱逐到另一地，它还像他所体验和确认的那样，出自于自己天性的基本特质，也表现了自己天性的基本特征。在《忏悔录》中，他

追述了蕴含于他全部存在之中的躁动，这种躁动迫使他逃离了巴黎社会。他补充说：“如果这场剧变只使我恢复原状，并且到此为止，那倒还好；可是不幸的很，它走过头了，很快就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极端。从此，我的灵魂一经开动，就保持不了它的重心，老是摆来摆去，不再停留下来。”^①

卢梭的一生动荡不安，这是因为，即便是远离了外部的威胁，他的性格也躲不进平衡里去。只有在最高度的紧张中，在其整个身心的彻底震荡中，他才可能达到他的成就。他的著作中，只有少数几本，如《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是慢慢打起腹稿的。而剩下的所有作品，都是猝然产生并且突如其来压向他的某种精神或心智危机的表现。他自己就曾以一种独特的和难忘的方式，描述过引发了他的第一篇《论文》^②和《新哀洛绮丝》的危机。而一旦有了这类体验，他便不得不一再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并且就像过去那样向壁营构它们。没有任何预见引导过他，使他得以免受他自身和所有他感到自己业已直面的非理性力量的袭击。纵观他的一生，我们总不免记起浮士德的台词：

我是流浪汉，无家可归地漂游，

① 《忏悔录》第九章，见中文本第二部，第516页。

② 指《论科学和艺术》。——译者注

是漫无目标又不稍停息的怪兽，
像巨大的飞瀑，直冲下岩石峡谷，
跳跃，狂怒，坠入深渊的底部！^①

卢梭执着追求的目标是崇高的，而且无法更崇高了；然而，他却感到自己无从把捉它们。而在脚下，他又看到了深渊，它近在咫尺，阴森可怖。

我们只要把康德的生活方式与此对照一下，立刻就能找出霄壤之别。秩序和法则、齐一和连贯，乃是康德生命的北斗。我们知道他如何把这种一贯性贯穿到简直是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中。事无巨细，他都将之程式化为一个适当的“公理”，并以一种坚定的韧劲来持之以恒。康德最早的传记作者们仔细而又谨慎地记述了某些事件，它们是如此离奇和独特，使我们不由为之捧腹。然而，它们仍然表现了康德性格中至深的谨严。这种谨严不允许他把日常行为中的一切——哪怕是最无足轻重的事情——归于偶然的统辖。这个意志，必须在它的独立性中，在它初始的自律中，来证明自己，并且支配起偶然性。

上述特性也为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康德的生涯定了调子。从一开始，他便全神贯注于一个特定的目标，并且拟定了一条相应的路线。在他最早发表的著作中，他便写道：“我已经找到了我要遵循的路线。

① 歌德：《浮士德》，泰勒英译本，纽约现代丛书版，第128页。

我将在自己的道路上进发，没有什么能让我撇弃它。”^①他在二十来岁时所说的这番话，正是他后来所身体力行的。不错，他的思想成熟得相当缓慢，而且并未避免关键性的突变。他自己就告诉过我们，多年以来他的思想经历过种种“紊乱”。然而，并没有任何一次“紊乱”否定过康德思想方法上的进步，或者有损过它的严格方法论的任何特点。这位“批判”思想家在理性能力中所发现的全部困难，甚至所有的背反，都使他只能更深邃地透入理性结构之中，并且愈来愈精确地规划出它的轮廓和结构秩序。对他而言，理性自有其力量，而且它通过自己的力量，肯定了本身的内在一贯的逻辑。于此逻辑中，理性永远拥有它最可信赖的北斗。而在经验领域内的每一步进程中，在一般自然哲学中，以及在有关人的特定学说——“哲学人类学”中，这颗天罡星都大可崇奉。

如果我们因此而既不能在个性和生活方式方面，又不能在思想方式和形态方面找出卢梭和康德的任何联系，那么，问题便产生了：那条把他们拴在一起的纽带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卢梭的风格不仅为康德所赞赏，而且还把康德一次次地吸引过来。事情不可能不如此。这是因为，在康德大受卢梭点染的那个生活阶段，他还没有变成一位仅仅关注“干巴巴的概念

^① 《康德全集》，第一卷，第8页。

解析”的纯粹分析家。他是一位文体家，一位心理漫笔者，而在这方面，他为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文章确立了一种新的典范。他在《对于美和崇高的感情的观察》中显示出精确的观察和晓畅熟练的表现力，而这些都在所有的后期著作中消失了。不过，尽管如此，康德却无意沉溺于卢梭藻饰的魔力之中；他宁可与这种魔力较量，并力图以一种冷静而稳健的判断力来取代它。他这样讲：“读卢梭的著作，必须读到他那华彩的文笔不再使我神魂颠倒为止，只有到那时候，我才能借理性去审察他。”^①

因而，在卢梭的著作中，康德既不想寻求刺激，也无意发掘情；他所寻觅的，毋宁说是一种理智与道德的抉择，而且正是为着这种抉择，卢梭才对他富有挑战性和感召力。受卢梭笔锋的触动，康德从世界观到人生观都开始转变。他本来以为，精神的修养及其稳步前进，必然卓有成效地改善人类，使之更加自由和幸福，但这种天真的自信受到了摇撼。他感到，如果“人的使命”问题能被给出哲学解，那他就必须另外的支点上应用杠杆。所有康德敢对卢梭之性格和气质所下的判语，都指向这里。他发觉了这种气质的自相矛盾。然而，这并没有惹他厌弃，相反却吸引了他，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卢梭那里看到，这个意志并不

^① 《片断》，第618页。

是乖僻偏执的，而是彻底恳挚坦荡的。他不同意把卢梭所有自相矛盾的命题都一概怀疑为虚伪，不认为他只是运用他那“非凡的才华和雄辩的魅力”来“做作出一种古怪，这种古怪可以以其迷人惑众和新奇怪诞来打败一切理智上的敌手。”^① 康德力图深入到卢梭思想的最终基础；他发现，这种基础不仅处于一种思想的特定模式，而且处于一种精神的确定“状态”。这种“状态”吸引了他，并在他心中产生了共鸣。

那么，这两种如此不同和对立的个性究竟在哪些方面得以靠拢？又究竟在哪些观念上契合一致？如果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便会不无惊异地发现，康德在卢梭身上所理解和赞赏的东西，正是那些不能为卢梭周围的人群所领略的东西。通过卢梭《忏悔录》中的说明，再加上从他书信中窥知的情况，我们看到了那种毁了他一生的悲剧性误解的起因。不错，卢梭的气质——善感性、偏激和带有病态的猜忌，都跟这种误解有牵连。但这些品性决不是唯一的缘由。卢梭的孤独感，导致了他的离群索居，而这就连他最亲近的朋友都不能理解或宽容。从一开始，他们就在他的茕茕孑立中只看到了一种转瞬即逝的冲动，而且还把他那执着的信念判定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偏执。

① 《片断》，第624页。

正是这种品性，造成了卢梭与狄德罗的决裂。狄德罗的每一封信都充溢着他对卢梭之命运的真切的友情和由衷的怜惜。但是，这位在其他场合如此敏锐的心理学家，一碰上卢梭的性情，就不免显得弩缓迟钝了。如所周知，当卢梭在狄德罗的《论自然》中读到“唯有罪人才渴望与世隔绝”时，感到了极度的伤害。他从未宽恕狄德罗的这些誓词。我们当然可以相信狄德罗的一再分辩——他的话决不是针对卢梭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里仍有真正的精神对立，这种对立随着岁月流逝必然会被日益清晰地感受到，它终将被证明是不可调和的。

狄德罗的全部运思都圈定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之内，他的所有念头都与此种秩序密切相关。他所主编的《百科全书》的根本任务，便是把思想提高到社会的水平，使其具有社会的而非个人的功能。狄德罗之所以可能达到某种成就，正是因为他念念不忘的唯有这桩事业，并且为它奉献了全部的智力和毅力。由于他自己是从巴黎社会出发，并且为着它而思考，所以他经常需要那个社会来刺激他的头脑，使之保持思想的活力。他的工作只有在巴黎沙龙的氛围中才能成功。尽管对自然同样抱有热情，并且同样献身于它，他却无法使自己挣脱这种标准。不仅如此，他还带着一种照我们今天看来不免离奇的幼稚，照样又为卢梭竖立了这样一种圭臬。

对狄德罗来说，卢梭在“退隐庐”的离群索居，好像是一种兴奋过了头的病态表现，而且一提到这件事，他就忍不住要怨尤和嘲讽。即便是在写给卢梭的企望言归于好并重建信任的信札中，这种怨尤也还是溢于言表。在一封信中，他甚至加上了一行轻蔑的附言：“别了，公民，一位隐士该是何等卓蹶冠群的公民呵！”^①不过，事实上，从最严肃庄重的意义上讲，卢梭刚好是这样一位“卓蹶冠群的公民”。他从一开始就跟社会相反相成：他不从社会中逃离，就不能效力于它，就不能向它奉献出他原可奉献的东西。在退隐庐，他反省了公民的职责，也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写出《社会契约论》来。而在《爱弥儿》中，他也始终如一：他要求在社会之外对爱弥儿施行教育，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唯一真实的意义上，为着社会而受教育。

康德对所有这些洞若观火。他为自己通过研读《爱弥儿》所得到的直接印象而叹服，并且因而获得了对于卢梭天性的真知灼见，而那些跟卢梭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甚至包括他最亲近的朋友，都不可能看得那样深。这是因为，康德并未被偏见所蔽。对于社会生活的价值，他既未夸大，也未低估。康德绝非孤高出世之辈；他追求而且珍视社会交往，并从中看到了

① 狄德罗一七五七年三月十日致卢梭信。

理智的和道德的律令。特别是在青年时代，他不由自主地醉心于社会交际的魅力之中；在哥尼斯堡的社交圈中，在商人和军官中间，康德“硕士”备受中产阶级和贵族的欢迎；他被看作一位优雅的交谈伙伴和一位深通世故的人。然而，如果说康德拥有这些长处并且试图去培养和完善它们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却从不可能欺骗他的眼睛。他从它们中间看到了一种生活的优雅和美化，却看不出任何足以构成和规定其真正价值的东西。对他来说，“习俗惯例”（mores）和“伦理道德”（morality）的要求是泾渭分明的。他对卢梭铭感五中，因为在就连最敏锐的头脑仿佛都已忘却此种泾渭之别的年代里，正是他毫厘不爽地划出了这条界线。

康德将此视作卢梭的创见。他并不认为卢梭想要借助于对自然状态的热情讴歌，令人们疏远文明，或者引人们返回蛮荒。他旗帜鲜明地驳斥了这种曾被伏尔泰尖酸辛辣地表达出来的对卢梭的猜疑。在关于人类学的讲演中，康德声称：“完全没有理由把卢梭对那些胆敢放弃自然状态的人类的申斥，看作一种对返回森林之原始状态的赞许。他的著作……其实并没有提出人们应该返回自然状态去，而只认为人们应该从他们目前所达到的水准去回顾它。”①

① 《人类学》，第一〇七节，见《康德全集》第八卷，第221页。

从康德的这种论点出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采纳了卢梭所谓“自然状态”的主张，而又在何种方向上进一步发挥了它。用他自己后来的术语来表述，他在其中所看到的不是一种构成的原理，而是一种调整的原理。在他的心目中，卢梭的理论不是关于既存事物的理论，而是关于应有事物的理论，不是对现成事物的描述，而是对适当出现事物的刻画，不是怀旧的哀歌，而是未来的预言。康德认为，这种表面上的怀旧观点理应有助于人们对未来的准备，并使他们能胜任于建设未来。当然不应该让人们与改造他们文明的使命相脱离，但却应该向他们说明，他们在文明中所引为荣耀的价值里，究竟有多少是赝品和虚饰。这种区分对于康德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他认识到，人类生活与经验中的每一种真正的价值律令都取决于它。对康德来说，没有任何一种纯然社会性的“德行”（virtues），无论它们看上去多么富有诱惑力，能够构成“德行”本身的真实含义。他在《人类学》中声称：“人们的每一种社会性的德行，仅只是一种符号。谁要是把这当作一块真金，就未免太幼稚了。”^①

康德彻悟出，文明的所有美德都自有其“价值”（value），但是这种“价值”并不足以保证它们有

① 《人类学》，第十四节，《康德全集》第八卷，第38页。